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
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07&ZD034）

新中国 意识形态 史论

●侯惠勤 姜迎春 吴波 著

XINZHONGGUO
YISHI XINGTAI SHILU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
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07&ZD034)

新中国 意识形态 史论

●侯惠勤 姜迎春 吴波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侯惠勤 姜迎春 吴波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212 - 04063 - 5

I . ①新… II . ① 侯… ②姜… ③吴… III . ①意识形态—中国—现代 IV . ①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656 号

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
侯惠勤 姜迎春 吴 波 著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胡正义 杜宇民

装帧设计:王国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 - 3533258 0551 - 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2.75 字数:365 千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4063 - 5 定价:6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总结历史经验所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原则/001
一、总结历史经验必须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出发/002
二、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003
三、总结历史经验必须重在弄清问题、分清思想和提高认识/006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历程/008
一、在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向的意识形态建设/009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013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017
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及其意识形态价值/022
第二章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尝试中的意识形态建设/028
一、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指导思想的转折/028
二、毛泽东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两根轴线：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032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和对人民公社运动的理论反思/035
四、反右倾斗争中的严重失误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加剧/039
第三章 “左”倾思想路线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042
一、触发“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批判运动和“五·一六”通知/042

- 二、林彪集团的政治野心及其唯意志论哲学/044
- 三、“四人帮”的斗争哲学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破坏/047

第四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051

- 一、思想大解放的底蕴：在坚持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051
- 二、理论联系实践的真谛：“结合”是如何可能的/056
- 三、解放思想的党性前提：在道路问题上全党要坚定不移/060

第五章 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064

- 一、不能有“两个邓小平”的误读/064
- 二、“非意识形态化”的由来及其挑战/065
- 三、寻找新的结合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068
- 四、铺设合作对话的平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071
- 五、不许触动底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坚定性/075

第六章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077

-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得失/077
- 二、我国意识形态的新的重大战略性转变/080
- 三、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082
- 四、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084
- 五、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人类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086
- 六、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088

第七章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090

- 一、意识形态的变革不同于“科学革命”/091
- 二、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关键/094
- 三、必须把握信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099
- 四、“中国模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106
- 五、旗帜与话语权/113

第八章 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文化问题/124
一、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124
二、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134
三、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文化建设问题/142
第九章 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问题/168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意义/168
二、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过高估计与意识形态发展的曲折/172
三、改革开放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实践中的意识形态问题/178
第十章 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思想路线问题/203
一、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203
二、克服主观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建设/208
三、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217
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229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整/229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实践/235
三、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241
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问题/250
一、对社会主义命题的重新认识/250
二、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重新认识/256
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261
四、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关系的重新认识/266
第十三章 改革开放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273
一、执政与改革开放双重条件下党的先进性课题的提出/273
二、“三个代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新探索/280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285
第十四章 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变化趋势与关键性问题/294
一、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变化预测的若干影响因素/294

二、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变化的三大趋势/300

第十五章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315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与实质/315

二、中国模式：概念与属性/322

三、中国模式与新中国两个 30 年/330

四、中国问题与科学发展观/334

五、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趋势/341

结束语 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347

一、毛泽东奠定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348

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改革式建构/350

三、新世纪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的伟大战略飞跃/353

参考文献/357

后 记/359

导论 总结历史经验所必须 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缔造新中国和领导建设新中国,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新中国的灵魂,也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或之后,我们都始终在紧紧抓住党的工作中心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①我们坚决不搞“两个马克思”(包含“两个邓小平”的割裂,不搞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不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现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科学的思想体系,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因而高度重视历史经验和历史趋势,重视治史。唐太宗之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这一民族传统的写照。中国共产党充分发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4—165 页。

扬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把善于总结历史作为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如同把握历史规律一样,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尤其是对于导致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历史失误的总结,更是检验一个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成熟程度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及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及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

这两次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总结历史提供了范本,其所遵循和贯彻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具体地说:

一、总结历史经验必须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出发

历史问题十分复杂,牵涉许多是非恩怨,总是众说纷纭。因此,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开创未来。这就需要摆脱个人恩怨、不受情绪左右,不仅要面对现实说真话,还要顾全大局、维护人民根本利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与具体的历史、阶级及政党的命运相连,因而是总结历史第一位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明确指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①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能正确奠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仅在现实中行不通,广大人民群众不会答应,而且在历史上站不住,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评价人物和历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第299页。

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①

我们讨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准确评价和把握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是个关键。首先,对毛泽东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评价,是否如同对其整体的评价一样,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灾难而言,重灾区也在意识形态领域。但是,相对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27年历史,“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一个历史的片断,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架构,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的;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根基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没有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因而尽管我国的意识形态受到重大伤害,但其社会主义性质仍然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其次,对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误,是否需要深入研究、透彻分析?一般地说,任何错误都需要研究和总结,这样才能避免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吃一堑,长一智”;特殊地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是前进过程中探索的错误,没有多少个人品质方面原因,因而更便于上升到理性高度认识,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成为后继者的宝贵财富。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们较为详尽地讨论了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的出现、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力求客观准确。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错误,有的是囿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难以完全避免(其表现就是许多人同时犯同样的错误);有的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的把握发生偏差造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还有的是其本意被扭曲、被推向反面,这里除了有个人的责任外,还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总之,通过讨论,要使毛泽东的失误成为可以理解的,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可以和历史相衔接的。

二、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把握历史的真实关键在于把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于成败得失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的原因作具体的分析,对革命和反革命、成绩和错误、主流和非主流作严格的区分,对集体的失误和责任与个人的错误作具体的区分。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特别批评了对于重大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态度的倾向,强调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①毛泽东在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三次“左”的思潮泛滥时,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以及社会根源方面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及其危害,而且没有否定一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②

邓小平主持建国以来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贯彻的也是这种作具体分析,不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态度。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定性分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成绩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正是在这个首要问题上,邓小平作了准确的分析判断:“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③

与这一定性分析相连的,就是个人的责任问题。毫无疑问,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于这一时期党所犯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党的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不仅对相关错误也负有责任,而且对于党的领导体制的不健全也负有责任。“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①因此，“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在分清正误及个人责任的同时，还深入探究造成这些错误的深层原因，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这一重大课题。他指出：“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②

正是不搞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我们在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同时，没有大刮“翻案”风，没有割断历史，保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原貌。比如反右的扩大化是一个错误，应当深刻认识和加以纠正。但是，根本否定右派的存在，或者借口其人数远少于我们划定的数字就否定反右的必要性，这不仅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会在现实中埋下动乱的祸因。鉴于此事关系重大，邓小平为此做了很详尽的分析：“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③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7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29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三、总结历史经验必须重在弄清问题、分清思想和提高认识

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方式,其对象是党所领导的事业发展史,其目的是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因此,分清是非主要是为了统一认识,更好地领导实践,而不是为了追究责任、惩办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就是基本方针。“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①

所谓弄清思想,就是把握历史的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整体,因此,历史的真实首先是不肢解、割断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个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落伍落后局面、开创伟大复兴的壮丽诗篇,因此,历史的真实就是要揭示成就这一伟大事业的深层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又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空前艰苦卓绝斗争、不断开拓前进的记载,因此,历史的真实就是要把这历史的每一步,无论是成功还是受挫,都弄明白、搞清楚。正是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包括思想史)中剔除,而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突出毛泽东思想的连贯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我们没有把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出现视为共和国历史上不可理喻的现象,而是坚持用理性的分析解释一切重大历史现象,包括一些非理性的历史疯狂现象;我们没有刻意回避一些所谓的历史敏感问题,凡属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于历史整体判断的思想理论,我们都力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把弄清思想摆在第一位,就是有利于将今天的实践作为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不能不加区分地把所有历史都视为“当代史”,也不能笼统地讲历史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和经验总结毫无疑义是为现实服务的,必须“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在首位。从现实情况看,有两种偏向很明显:一是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裂和对立,否定其中一段历史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说,“左”和右的两极在结论上是相反的,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相通的;另一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所谓纯学术研究,把在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中也不能作为根本方法的考据学方法无条件地移植,视为立足于总结经验的历史问题研究的最科学的方法,因而着眼点不是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而是材料挂帅、就事论事。前一种偏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较容易警觉和鉴别,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偏向以所谓的学术性为本钱,很容易唬人。实际上,考据最多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必须指出,光靠考据学也很难做到这点),而难以真正确立史料的历史价值,达到历史的真实,即其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历史。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迷信考据方法的氛围下,往往给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借考据材料或泄私愤、或哗众取宠、或以售其奸,通过丑化历史、丑化领袖、丑化党和国家,达到颠覆历史、把握话语权的政治意图者有之,达到图一时之快、行卖弄机巧、获不实之名的沽名钓誉者有之,最好的后果,也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获得微观的某些知识,却不能上升为对历史全貌的知识。可见,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认识,正确的方法论确实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性胜利。随着中国历史的巨轮驶入社会主义的航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就面临着又一全新的历史环境,艰难曲折便在所难免。对于即将来临的巨大困难,应当说中国共产党还是有所准备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敲响警钟:“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①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这个提醒是何等的重要。对于一个正处在历史大转变时期的党,如何看待这个转变,如何适应这个转变,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并善于重新学习,是关系到新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一招不慎就会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言,它已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灵魂。这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并发挥着重大影响的事实本身,充分表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创造性加以运用和发展的双重任务都十分重要。坚持和发展的矛盾统一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的动因。

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看,制约马克思主义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些主要矛盾关系是:结构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和它的当代形态的矛盾关系;功能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的矛盾关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元论和社会实际发展中的多样性思潮的矛盾关系等。这些都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关系在思想领域内的具体展现。而从人际关系上看,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0 页。

党内各种关系以及党内知识分子的关系对上述矛盾关系的处理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偏离了对上述矛盾关系的辩证把握,就必然发生指导思想上“左”的或右的失误,从而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

一、在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完成 向社会主义转向的意识形态建设

建国以后,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这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推翻旧制度向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转变。为了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从一开始就有三大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1)如何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所遗留的任务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以建立能够有效地协调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动的各种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新型社会制度;(2)如何在恢复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建立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3)如何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且其成员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加强自身的建设,以建立能有效抵御权力腐蚀而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和“人民公仆”本色的权力制约机制。对于上述新课题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固然需要各方的努力和重新学习,但首要的是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国初期便形成了高潮。

和以往仅限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理论学习不同,这次学习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参加学习的是大量新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和从事教育、科研、文艺、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以转变和改造其旧的世界观,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变革和形势发展需要的大批专门人才,借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这样做无疑是必要的。广大干部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能否巩固和有效运转。但是当时的现状却是,我国几百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低,懂得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多。相反,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却有着广泛的影响。对封建文化的迷恋和对西式民主的崇拜,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与人民大众和新中国格格不入。这是旧式教育制度和旧社会土壤遗留下来的痼疾。当中国历史翻开了新一页的时候,一方面,新政权必须吸收千百万

知识分子为之服务，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其所面临的伟大任务；另一方面，新政权从本质上讲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不填平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历史鸿沟，新政权同样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在 1951 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学习和批判，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两大推动力。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成为全体干部和知识阶层的指导思想，以端正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批判，则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错误的政治和思想观点，以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为此，1950 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人民日报》在 1951 年 1 月 29 日发表的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界肃清各种形式的反动哲学思潮及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在思想上所履行的批判的革命的任务，不仅对于我们党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时它对于我们全国人民也有极伟大的意义。”社论号召：“政治和经济任何部门的干部，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用实践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端正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自己的能力，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

学习和批判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的，并非如西方传媒所渲染的那种“洗脑筋”。这种自觉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首先在于社会变化和形势发展同人们原先的旧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学习就要落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马克思主义确实成为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在 1951 年致李达的信中对此感受颇深，他特别强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①事实上，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学习运动，就始于 1951 年 9 月北京大学 12 位著名教授所发起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

其次，这种自觉的思想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还在于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和正确引导，因而造成了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光荣的社会大环境。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在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7 页。